

第五章 代結論—邁向後民族主義的未來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在思考中國的現今與未來的發展走向時，會將這個問題連結到中國這個「國家」的定位與功能之上。之所以要注重「國家」的定位問題，乃在於「中國」這個意義符號，已不僅僅代表著傳統的國家概念，而幾乎是成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在對抗、排拒西方勢力入侵時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在這樣一種情況形成的同時，中共仍必須向西方進行有限度的學習，以建立類於西方式的主權國家型態來與西方抗衡。¹

這種「反身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lism)，在接受了或認同了東方主義者對東方或中國的現狀定義之後，選擇以東方主義的定義，接受中國是一種「落後的」、「未開發完全」的概念，以致於他們似乎仍被這樣一種來自於西方的論述所制約；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單單排斥西方的技術與思維，因為他們了解到現代化的意涵，使其的論述成為一種較為中庸的訴求。²事實上，這樣的訴求即使較為穩健，但當國家或民族遭遇到較為嚴峻的挑戰之時，則很難用如此的態度去面對問題，因為問題往往都會上升到國家、民族意識的重建或認同的層次。

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當中國自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獲得成功之後，歷經了長時間的社會動盪與不安，與西方勢力的持續入侵，最終在一九四九年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擊敗了資本主義列強支持的國民黨政府，將中國帶往另一個不同的氛圍之中，這是歷史長期變動狀況底下的一個中繼點，也是孰強孰弱的一個現實課題。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獲得艱辛奮鬥之後的勝利，基本上有幾項重點，是共產黨得利的主因。

在軍事上，共產黨軍隊的游擊策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機動性的拖垮了

¹ 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2002)，頁 50。

² 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頁 65~66。

大批大批集結的國民黨軍隊；在政治上，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傾軋不斷，各軍系與蔣介石的嫡系關係若即若離，各方都在為自身的前途做打算，相反的，共產黨方面雖然也有國際派與本土派的鬥爭，但毛在鬥爭期間，有效的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對共區的人民灌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與意涵，並透過一系列的改造搶救運動，建構出全新的人或個體，使得其能夠獲勝，並將個人聲望推至最高，以致於能夠在表面上收編了各項勢力，形成一種表面和諧的意象，也適時的團結中國共產黨，來面對各懷鬼胎的國民黨成員。

基本上，毛澤東與中共主流人士，所建構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影響了相當多的民眾，涵蓋由農民、工人、學生、知識份子、軍人、政治人物與實業家等大量的群體；而國民黨沒有能夠建立一套有效的意義論述或價值觀，而總只是向西方勢力靠攏，即使有「三民主義」作為護身符，但民眾看到的多為權力場上的鬥爭，並未能夠看到三民主義的真正實踐。也就是說，中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給民眾的除了實際的作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中華民族一種新認同感的建立，亦即，一種「民族認同」的新依歸。講的更精確一點，國民黨失敗的因素，很重要的就是他們無法創造出感動人心、感動民族的論述與文化，他們帶給民族大眾的感覺，只是與西方的眉來眼去，只是不斷的鬥爭，這對於長期以來受到西方勢力壓榨的平民大眾而言，當然是毫無正面與積極的作用力存在，也因此種下了敗退的因。

這樣一種從民族角度出發，所形構或鋪陳的論述，讓人民能夠藉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由中共介紹、詮釋出的馬克思主義，重新認清民族與個人所佔有的能力與地位，當然，筆者在此不否認中共所佔有的「文化權力」與「壟斷力量」，使得他們能夠塑造出一種新的或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一種適合中國發展或更為貼近人民的論述與思想，但國民黨在他的領域中，雖然也佔有著同樣的「文化權力」與「壟斷力量」，但卻不能夠因此感動人心、收取民族的認同，這就是

兩個不同主體間誰成誰敗的重要關鍵點。

中國在儒家文化勢力獨占將近兩千年的時光中，當然有一段不短的興盛期，這段期間內，生活在不同朝代中的「人民」，對於所處國家的強盛與獨霸，自然有深厚的認同意識，「中國」這樣一種文字符號的建構，也就是在如此這般的民族意識、民族文化中被影響乃至於出現的，這與西方亦曾出現的「日不落國」概念亦有相似之處。不過，這種由儒家文化主宰的中國社會，長期下來亦出現相當多的弊病與陳疾，依靠「傳統」並不能有效的根治，也因此，才會有清末的洋務運動等轉變出現。但這樣的轉變，基本上仍是在儒家文化、傳統思想的基礎上進行，所以並不能夠造成真正的藥到病除之效果。

加以中國在清末以來所受到西方勢力的挑撥與侵蝕，更加深了民族的「受害者心態」，在這樣的歷史機緣中，誰能夠讓民族獲得感動，誰能夠讓民族重拾自信，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與策略，相當程度的使得中國人民有了另一種新的希望，在此中我們並不能忽視毛澤東將這項策略視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因素，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一方面在爭權奪利，另一方面，則有效的鋪陳他的論述概念，適時的獲取民眾與黨內多數的認同；他將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亦源自「西方」的論述，轉而成為中國式的文化概念，有效的挑起了中國人的「文化中心」、或自歷史長期發展以來的文化霸權意識。

也就是說，毛澤東建構出一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除了穩固他在統治上、在黨內地位上的尊崇之外，這樣一種隱含「民族」或本土意涵的概念，相當程度上也獲得民眾的認同，因為民眾再度被引薦、被教導或吸收到發源自中國本土的意識形態，即使這樣一種發源於中國的論述，事實上仍是西方影響下的產物；毛澤東有效的區分出我/他之間的區隔，這個我/他包含了共產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東方/西方，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其他民族的不同，

這樣的論述策略，不是要強調中國如何的強大、中國如何的厲害，而是試圖創建出一套新的文化、或新的傳統法則，讓民族大眾能夠重拾對「中華文化」的信心，也因此，毛在建構論述的過程中，即使他也認為要適時的拋棄過往的窠臼，但仍然借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概念意涵，或鄉間俗語作為輔助工具，使其的論述能夠更加親近人民，也更容易被了解與接受。

在其獲得成功之後，他所鋪陳與建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策略，經過時間的流逝，逐漸的被「毛澤東思想」這個符號所掩蓋，除了「中國傳統」中的「馬屁文化」因素之外，這樣一種「毛澤東思想」符號的提出，更加深了中共思想與論述的「中華性」、「本土性」或「自源性」，反映出中共是源生自「中華民族」、中共的論述是「民族」的產物之感受。不過，個人或群體的思想、社會或國家的文化，是各式各樣的浮動的、持續發展的動態機制與過程，毛的思想，事實上也是隨著時間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論述呈現。只是，這種不同的概念呈現，到了毛時代的中後期，卻成為不少人的夢靨。

毛時期中共的民族主義策略，在建政前，是以塑造「新的文化」、「新的傳統」來作為民族大眾重新認同的依據。這種「新文化」標榜的是結合外來的、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源自中國的傳統文化，兩者是互為搭配與存在的；有些論者在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課題時，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³而這其實是相當化約的做法與敘述；應當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的轉向與「因中國而制宜」的概念，而中國傳統文化在毛時期的現代化，則是配合著「馬克思主義」這個符號的進入與轉向所形成的概念，因此兩者不能夠斷然的分開，但也不能夠隨意的等同，而是互相辯證、互為式的存在與出現。

³ 左亞文、韓美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個維度」，*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07年3月)，頁20~21。

中國傳統文化在毛時期的角色，也是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不同的意味。在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述的蓬勃發展期之中，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論述被引用、被重新提入毛澤東的思想內部，毛澤東這樣的用意在於，若是僅照搬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至中國這塊土地上，則一來，會與國際派區隔不出分別，二來，則是降低了塑造民族新文化、爭取民眾認同的可能性，因此，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時，若是能夠有效的搭配傳統文化，將兩者有機的結合，則更能收到傳遞與吸納的效果，事實證明，毛在這方面，的確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不過，當建政之初，為了打消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問題，除了在社會上進行「三反五反」運動，⁴中共同時也批判了許多其認為的封建與資產階級代表者的戲劇、著作與論述；在這樣的過程中，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蛻變而生的「毛澤東思想」與它的兄弟——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列寧主義陸續進入中國人民受教的課堂、報紙與節目之上，中共利用這樣的做法，試圖消除傳統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可能造成的貽害；更重要的，毛在之後將其青年時期的理想性格展露無遺，將中國的落後現實視為超越發達國家的基石，挑起民族大眾的情緒，以極近誇張的手法與論述，企圖將中國快速的推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美麗境界之中。

也可以這麼說，當外國、當許多國內的知識份子皆認為中國處在一種落後的狀態下，毛澤東與其信徒卻扭轉了這樣的概念。他不認為中國當時是純粹「落後的」，或是在落後的另一面，中國是充滿無限機會與活力的，亦即，面對這樣的一體兩面式的情況，毛澤東更加著重在光明與理想這塊領域之上，配合其黨機器有效的進行宣傳工作，使廣大人民願意在這樣一種關係到「民族的成敗」之上做出奉獻。轉個方向來看，這也是因為廣大人民所接收到的訊息、教育，幾乎就是

⁴ 三反五反，是1951年中共所展開的政治運動。「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與企業之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人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請參閱，毛澤東，「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53~58。

由中共所制定出的課綱而來，是「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民眾很難吸收到不同的聲音，而只知道為民族的自尊與重建自信做出努力。

亦即，中共掌控了文化教育的壟斷權，與思想控制的主導權，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在這個階段中重要性已然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思想」與其兄弟們。毛也成功的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介，或作為一種載體，教導人民、引起人民的民族認同感，讓人民大眾為其勞心勞力的付出。當然，也就因為仍有知識份子與黨內其他階層的雜音存在，毛更進一步的要打破傳統文化的制約，因此爆發文革、進行一系列的破舊立新活動，企圖真正創造出「全新的」、「嶄新的」中國文化，以更快的邁入理想社會之中。

雖然論者多將毛的呼風喚雨的能力，歸咎到其的「民粹主義」煽動力量之上，但民粹之所以能夠顯現、能夠有力的發展，則與強調「中國」或「中華民族」又有很大的關聯性存在，而這樣的過程，在毛時期之中總是可見其蹤跡。不論是外交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基本上毛與中共都在有意或無意間利用「文化」作為槓桿，塑造屬於「中國」的論述與政策方針；或許真正的政策內容仍參雜了蘇聯的意見，或甚至資本主義的某些方式，但一旦將這些東西都掛上「中國的」、「中華民族的」這樣的符號時，加以配合國家的文化生產機制，就可以更順利的強化人民對於這些政策與論述的認同，也進一步對毛與中共產生認同，讓社會與國家朝著毛心目中的理想狀態前進。

其實，所謂中國的「傳統」或「文化」，在毛統治的階段中，多是以「工具」或「載體」的形式存在的，到最後這種工具或載體的效用無法彰顯之後，則又被屏除在政策核心之外，遭到強烈的批判。也可以這麼說，在文革之前，中共與毛無時無刻都在建構一套新的文化與論述，獲取人們的認同，希求中國可以拋開過往的失落，重新站起來，這一套論述，就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其延伸出

之「毛澤東思想」為主體；但到了毛後期，「階級鬥爭」成為毛思想中的唯一主幹，他認為不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就連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中，也會有階級矛盾的問題產生，因此革命是要革一輩子的命，是無窮盡的終身任務。到這個階段，毛思想或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取代了一切，成為文革期間主宰中國的「主流文化」。

當然，論者也多宣稱，前述的民粹主義，更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能夠毫無忌憚，放手一搏的背後依據，但其實，前述已經說過，我們不能夠只看「當時」的民粹表徵，而應該更注意長期以來毛澤東與中共所鋪陳與建構的「民族」概念，以及伴隨著這種「民族建構」而來的種種現象。基本上，在毛澤東時期，牽制著他論述與施政的力量在於，中國的「文化」與「民族性」是否有真正的與時俱進，還是仍舊落後不堪，也就是說，毛會依其的觀察與思考邏輯，對於社會與現實狀況進行修正與改進；當然，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毛不免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但同時間，他也確實拋開「本本」，不照所謂的教條行事，依舊在某個層面上實踐他的個人哲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包含的內容。

相較於毛，鄧小平時期的「新文化」，就是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軸、或以發展生產力為主體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本，鄧小平企圖跳脫出毛後期所呈現的文化停滯狀態，並將民族注目的重心與焦點有效的轉移到經濟發展的層面之上，使階級鬥爭成為一個過時的、舊的文化，不需再大力的宣傳與散佈。鄧小平秉持的是更為實際的做法，他以資本主義的手法進行經濟改革，但又將之放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底下，使中共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不至於受到挑戰；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因為了解實際的社會狀況，知道人民在經過長時間的鬥爭之後心理與身理的疲態，因此，他將民族發展的課題定位在經濟成長之上，試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再度凝聚人民的認同，讓社會早日從過去的紛爭狀態走出。

而在同期間，整個世界實際上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西方的文化與各種思想也因為改革開放的關係進入到中國。鄧小平為了維持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並且將中國的發展能夠按照其設想模式前進，也勢必要發展出一套可讓人民認同的新文化，以此建構出新的民族性，以抵擋來自西方的新一波挑戰。因此，這樣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述的建構，就成為新中國與鄧小平的重要任務。

在此，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共在建構不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所強調的都是「中國」，而非「中共」，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中共以及毛、鄧等領導人，雖然都以維護中共統治的長期穩定作為職志，但他們也都清楚的認知，若是單單的以「中共」為主體，則更容易予人「為一黨之私」等類似的看法，這樣一來，不僅是中共能否永續執政的問題，更基礎的，連中共能否獲得勝利都有很大的疑問存在。因此，當他們為了營造民族團結、塑造民族性而必須做文化的重新建構與鋪陳之時，「中國」而非「中共」就變成其所特別重視的符號。

也就是說，不論是毛澤東或鄧小平，即使他們實際上都只是為了個人的權力與黨的永固做任何的拼鬥，但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總能夠構築出讓廣大民眾認同與支持的論述，以非直接的方式獲取期待中的成功。這種種強調「中國」或「中華民族」的論述，透過教育體制與大眾傳媒的流轉，深入到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深植於人民的心中，當人們在工作、在參與經濟改革的措施時，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在為中共或是毛、鄧做貢獻，而是以為「中國」做奉獻為重點。當然，在毛晚期，由於毛的神格化、毛等同於中國的意念深入人心，當人們實踐各種政策與論述時，會宣稱是為了毛主席而做的，但必須要認知的是，當時的毛澤東就是中國，中國就是毛澤東，毛澤東代表了中國與中華民族，所以，基本上毛、鄧時期塑造出的「中國情懷」，是讓民族大眾奮力支持的重要因素。

不過，鄧小平雖然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但在其統治後期，仍然發生了撼動中外的六四事件，相當程度代表他的施政措施仍然未能盡善盡美，獲得普遍的認可。也因此，當中共鎮壓完這場民主運動之後，急需重建的課題是，如何讓人民大眾從事件的不滿與悲痛中走出，而這個時候，持續發展經濟與限制他國插手介入就成了鄧以及中共可以利用的武器。基本上，自八零年代初始，中共即開始著手發展一套愛國主義，以這樣的模式限制人民與外來文化的接觸；更重要的，這樣一套愛國主義，將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某些議題或論述，與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所追求的「現代化」做結合，⁵很明顯的，這是中共與鄧小平一方面坦承中國屬於「落後」的一方，需要追上西方的「現代化」腳步，另一方面，在認同「現代化」的同時，仍必須堅持民族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因此，才會又將儒家思想文化搬上檯面。這是為了告訴大眾，中國傳統文化就隱含著現代化的邏輯，所以，當中國進行現代化的工作時，可以不那麼借重西方的思想文化，而只需多從傳統中找尋蛛絲馬跡即可。

當然，這也是一種強調民族優越性的論述建構。事實上，中共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對於傳統文化的定位，是抱著時而尊重時而棄之如蔽屣的態度，不同的態度端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與領導人的思維狀態而定。但很重要的，傳統文化在中共的概念中，不再是具有崇高無上的地位，而是需要隨著時代與環境的改變，對其進行修正，也就是說，中共長久以來，都是將傳統文化當作一個對照或參考的對象，或將它納入中共的「新傳統」與「新文化」的論述建構之中，以此作為推動社會改革與清除過往劣習的手段。不過，當中共面對到外國與西方勢力的如波浪般的拍打之時，強調「民族傳統」或所謂「文化本位」的思想，又總會無巧不巧的出現，因為中共害怕或恐懼西方的文化思想會對廣大的人民起到效用，所以他們總會試圖從傳統文化之中找尋可以解釋西方邏輯、或是可以套用至西方作為之上的論述話語，進一步用中共的話語權力，對傳統文化論述做新的詮

⁵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144~146。

釋，爾後，再藉由教育與傳媒的散佈力量，發送給廣大的人民群眾，以此塑造一種新的「民族文化優越性」的概念，強調西方的種種其實都在中國傳統中可以找尋的到，隱約又形成一種文化優越的狀態。

這種重提「傳統」，或緬懷「過去」的手法，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人民互相碰撞接觸之後，為了保護自身特性的存在與穩定，因而發展出的方法。也可以這麼說，強調傳統，或緬懷過去，是不同民族間互相刺激、挑戰的手法，也是民族內部成員適應生活、維繫民族團結性的方法，更是確立民族存在的作為；⁶當然，這樣一種所謂的「傳統」或「過去性」，多為擁有政治權力或文化詮釋權的個人或群體所建構出的一套文化論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這些上層權力者所擁有的力量之外，一般平民、或根本不會去關注這些焦點的普羅大眾，他們對統治者建構出的論述進行擁護的行為，才是這樣的議題建構能夠成功的基礎。

也就是說，除了上位者的民族話語建構能力之外，底層與平民大眾的接受與反應能力，是同樣不能忽視的課題。一般的論者也會注意到這兩種概念的存在，但常常會過於偏重某個面向。當我們在討論中國與中共的民族主義時，論者多會注重由毛、鄧所建構的民族式話語，或所謂的新傳統與新文化，但也因此可能忽略了由大眾所做出的反應與支持行為，亦即，「上層民族主義」與「下層(大眾)民族主義」其實是互為表裡，互相影響與互相保護的，缺一則兩者可能都無法順利的執行與發展，民族主義的保護能力也可能因此降低或甚至破滅。

當然，上層的民族主義論述建構能力，長期以來都是中共領導人所必須具備的。從毛澤東到胡錦濤，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基本上，不論「傳統」與「過去」在不同的時間點中代表何種意義，文化的角色

⁶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黃燕堃譯，「族群身分的建構—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與族裔身分」，載於許寶強、羅永生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112~113。

或文化的重新建構，是影響著領導人進行民族話語鋪陳的重要因素。而下層(大眾)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扮演接收者的角色之外，同時也要適時的展現人民的意志，這就表現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擁護、甚至在江胡時期由人民自發性的進行民族主義式的遊行抗議活動之中。不可否認的，中共一黨獨大的權力體制，使得一般人民很難發表不同於社會「主流」的意見，中共也確確實實持續對這樣的非主流意見進行批判甚至逮捕某些異議份子，但隨著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在經濟上獲得跳脫既定概念的成長速率時，大部分的民眾，都將這樣的「功績」歸於改革開放的先驅者與執行者，也就是鄧小平以降的中共統治階層以及中共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的成功恢復，不但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性，同樣的，他們在這樣的成功中接收到來自西方世界的重視，西方世界也無法不重視中國的重要性，這都更加深「中國人」重返過往榮耀的心態，一種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內在思維。

亦即，當中國從文革中的殘破狀態以經濟改革的方式重拾過往的信心之時，民族主義式的話語建構與論述，更能夠引發人民大眾的共鳴。在過往，毛澤東統治時期，人民雖然也會遵照統治者的意念，守護著由統治階層訂定的民族規範，但由於中國在國際上或甚至在其國內都未能有真正突出的表現，使得人民通常是「被動的」被激起動力以致於執行，而不是出於一種「主動的」態度。但是，當中共進行改革開放，並確實獲得成功的效應時，此時的國民，已不同於以往的被動，而漸漸的在被動與主動間找尋發揮的空間，甚至日趨形成主動的態勢，這是因為中國再度站上國際舞台、並受到全球關注之後，人民被這樣一種氛圍所感染，因此更能夠以身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自居，以身為生活在其中的一個個體為榮。

此外，中共在建構與鋪陳有關的民族主義論述時，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其實是一種「動態

的」與「實踐性」相融的現象。基本上，這樣一種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是會呈現出某種文化實踐、創造或文化歷史建立的活動概念，同時也是一種具備著一般行動所擁有的有限結構與意義行為，並存有著一般行動所擁有的無限結構與歷史意義的建構行為，這是兼容著現實與可能的雙重性動態架構。⁷但如果我們將這些概念放至中共建構出的民族主義論述之中，似乎也可以看出隱藏在其中的類似的意涵存在。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論述，實際上，他們的發展過程，從一種結合了「馬克思主義」中的核心價值與中共歷史實踐過程之下的綜合體，更可以說，這是一種掛著馬克思主義的外皮，內含的卻是包羅萬象的、適合「中國特性」或符合「中國的」一種創新文化建構，爾後更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其代表，到結合「毛澤東思想」中的核心價值，與中國的現實狀況所發展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或後人稱之為「鄧小平理論」的架構，乃至於江澤民、胡錦濤結合「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現實情況所發展出的各項語言論述建構，實際上都是一種創造性的，並規劃出或試圖勾勒出一張美好的地圖供人們遵循與參考；甚至，當中共領導人在建構這些論述，以供人民遵循甚至藉此挑起民族性，維護「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與獨立性時，其中隱含的權力機制試圖維護其權力的永存性意念，亦是相當明顯的。亦即，中共所建構出的這種論述，相當程度結合了「現實」與「可能性」，並且中共透過權力機制所掌握的教育與傳媒等各項文化傳播力量，將不同時期的不同論述傳送給一般人民接收與了解，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領導階層想維護或保持他個人或所謂領導班子權力的穩固性，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雖然這樣的建構過程，表現出確實是充滿著權力拼搏的意義，但實際上，卻又兼顧著修正前者、引申出或激發出後者的一種動態持續性與創造行為，而不是單單的權力複製機制而已。

⁷ 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2002)，頁 83~98。

當然，上述這些中共建構相關民族主義論述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社會中領導統治階層的手法幾乎如出一徹，這也更能夠代表中共或中國當代社會，並不是一個傳統下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兼收著「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甚至是「後社會」與「後資本」的複合性政權；而且，在這樣的西方理論架構之下，論者所強調的「文化再生產」過程，是一種追尋更寬廣與更理想的自由概念，但實際上不只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眼中的「東方國家」—中國，這樣的文化生產機制，確實已成為權力機制的工具或壟斷方式，相當程度上，已喪失了它原本應該存有的自由性質。

不過，當我們在討論到中共這樣的民族主義論述建構，是否已成為上層領導的一言堂時，似乎又可發現在近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內部的學者或論述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建構一套由中國中心思考或出發的民族主義論述，而不是從所謂西方的角度來建構；其實，西方所定義下的「自由」或「民主」乃至於其他所謂的社會基本價值，基本上是西方世界發展數百年而來的籠統性的概念，在目前，甚至只是由某些強權「自由」定義而已，而往往未能夠妥善的、實際的觀察或研究這樣的概念是否能夠真正的「普世化」或「全球化」。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基本上就是在維護中國的「主體性」與「獨特性」，當中共領導者與領導階層在建構他們的民族式論述與語言時，很重要並影響他們的，就是如何用最基本與最簡單的文字，讓中國內部的人民能夠順利的形成「共識」，以此向西方築起一道隱形之牆，試圖防衛中國不受西方文化太多的介入與影響。

也因此，中共近期的民族主義形式，有論者認為是種「務實性」的民族主義，或是一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是為了一邊進行發展，一邊又要抗拒西方文化的大舉入侵所形成的現象。的確，這些論述，一定程度代表中國或中共並非是要以「擴張性」的民族主義或「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乃至於「文化霸權式」的概念再次進入世界大舞台，但在這樣一種強調「務實」或「防禦」的基調之下，似乎

又代表著，中共與中國的論述建構，仍受到「西方」太多的制約與影響，因此必須根據西方的「評價」來調整其本身的話語建構甚至是政策產出。這樣的情況，在無形中使得中國或中共雖然長期以來都能夠建構出屬於其自身的民族主義論述，並且藉此抵擋外國的勢力，但究其發展過程，也幾乎都是因著西方的觀點與腳步在進行論述的修改與調整；可以這麼說，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論述建構，表面上看起來中共自身佔有著絕佳的操控能力，但相當程度上，他們仍多少受制於來自於其他地區與國家的影響與無形的操控。

亦即，雖然在全球化的強力浪潮底下，任何一個國家、組織乃至於個人，都很難不受到其他勢力的影響，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本身的主體性不被敲破，是很困難但又必須去堅守的目標。特別是在地球村逐漸形成的時候，國家與國家間的隔閡與距離逐漸縮小，所謂主權與領土間的界線也日益削弱，當然，這不代表民族國家就會因此瓦解，但很重要的是，舊時強調維護民族自身利益的概念，也因為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越來越多的互動與接觸而必須做出改變，例如能源污染、地球暖化、環境開發過度等問題，事實上都牽扯到某些地區與某些國家的自身利益，但更重要的，這些問題影響的是在全世界、整個地球之上生活的各民族、各族裔的人民，若是某國堅持以封閉式的民族主義形式來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則很有可能造成全體世界人民的共同挫敗與無可挽救的未來。

因此，如何在現今的狀況下，發展出一套跨主權的、跨地域的具有複合性質的民族主義架構，是當今身處在世界之中的每個個體所要思考的課題。當然，以馬克思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內部的對抗性剝削若能夠消失，則民族對民族的剝削也會消失，彼此的敵對關係也會消失，⁸這似乎呈現一種漸進式的「跨民族」觀念。而在現今，參考由馬克思流傳至今的想法，若是可以以一種「世界性民族

⁸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271~307。

主義」做為代表，以跨民族的角度切入，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世界上原有的霸權與強權國家會更努力的將他們的文化與經濟等各層次之影響力傳入其他區域與其他國家，但更多的時候，我們要面對的是更全面性的問題、更「全球化」的問題；中共在面臨這樣的情況時，該如何展現其「大國風範」，以跳脫傳統民族主義的概念架構來思考問題，亦是中國在新階段的世界發展情勢之下要面對的課題。

可以預期的是，中共面臨這樣的情況下將會宣稱，他們還未發展全面，國力未臻完備，因此這種任務，還不能夠接受。不過，中共在推廣儒家文化、傳統文化至他國、其他地區的同時，相當程度上也隱含了某種全球性質的大同主義在內；我們不能否認，中共這樣的行為，與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大國一樣，就是一種大國的文化霸權行為，但是，至少西方或美國在推廣他們自身的「自由民主」思想文化時，近期以來多是以「武力」進行強迫性的改造，效果似乎也都不彰，而中國以較為低調的做法，傳播中國的文化思想；當然，這樣的文化思想，與過往中國傳統已有不同的涵義，這已經是經過文化流轉數千年、中共又加以改造與包裝過後的「中國文化」或所謂的「新的中國文明秩序」，⁹但以這樣柔和的形式相較於西方的摧枯拉朽式的進攻，似乎削減了不少中共或中國過往帶給世人的不好印象。

簡言之，中共在全球化之下，不應該以成為一個「霸權」或「大國」為目的，而是要能夠建構出一套有效的文化邏輯論述，或是俗稱的軟實力、軟權力，打破較為封閉式的民族主義邏輯，而進一步建構出開放式的、全球性的「跨民族民族主義」或一種「後現代民族主義」，跳脫主權與領土界限或「民族利益」的陳舊課題，以更為開放的心態來看待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與融合，以及各種隨之而來

⁹ 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現代性與中國對新文化秩序的追求」，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43-45。

的疑難雜症；當然，「主體性」與「獨特性」的維護，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看似較難保持，但歷史發展告訴我們，文化本就是透過互相的接觸、互相的融合而不斷的產出、修正、再產出，這是一種動態流轉的過程，世界上應當沒有一種「本真的」或「純潔的」文化或民族。

亦即，在和他國、他民族進行互動的時候，適時的接納與傳送各自的文化，豐富自身文化與民族的內涵，並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某種形式的「暫定共識」，這樣一來，對於降低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歧見與敵視，增進各民族、各國之間的合作發展，會是較為柔性與有效的做法。當然，中共將會採取何種態度，來持續建構其民族主義的論述，勢必會影響到中國在日後不論是進行國內的發展，或與其他民族、國家的互動。因此，中國是否能夠真正跳脫出過往的窠臼，發展出一條嶄新的民族道路，相信是其能否持續進行發展，並贏得更多民族與國家的認同的重要關鍵點！